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陕县党史资料

(第三辑)

纪念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六十周年



中共陕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



目 录

〔专题资料〕

国民军参加北伐经陕州东进记述…………… (1)

〔转载〕

亲切的勉励

——记邓小平同志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

……………冯洪达、余华心 (12)

〔革命回忆录〕

我对一九二七年初在陕州时情况的回忆

……………张楠 (17)

大革命时期我在陕州………凌勉之 (20)

冯玉祥部队驻陕州期间亲历记

……………乔紫亭 (22)

陕县大土豪魏国藩在大革命时期被枪决

……………周庠 (25)

〔资料选摘〕

《汉口民国日报》报导选载：

冯总司令占领陕州…………… (26)

冯总司令克复陕州后，刘镇华部

纷纷投降…………… (28)

社论：巩固后方·····	(30)
第二集团军由陕州东进，十日占领	
洛阳·····	(32)
宣侠父著《西北远征记》摘抄·····	(27)
国民军致第三国际电·····	(44)
中共派往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主要	
党员干部名单·····	(45)
《中华民国史资料》摘抄·····	(46)
大革命时期冯玉祥立在陕县的施政纲领石碑	
碑文·····	(47)
编后·····	(48)

国民军参加北伐经陕州东进记述

中共陕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冯玉祥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当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积极赞助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组织国民联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誓师五原，参加北伐，东出潼关，会师中原，对消灭反动军阀势力，促进北伐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冯玉祥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①

（一）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春，正值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迅速发展的时期，具有革命倾向的冯玉祥将军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发动了“北京政变”，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当时，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采取了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张作霖的正确策略，积极支持冯玉祥的革命行动。李大钊亲自做冯玉祥的工作，与他交谈当时的政治形势；又派其他同志对冯玉祥部下的主要将领做工作，向他们宣传和解释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主张。并派出许多同志直接深入到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积极争取冯

玉祥的国民军转到同情革命的立场上。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对冯玉祥倾向革命影响很大。当时，“冯玉祥曾密嘱鹿钟麟对群众运动要加以保护”^②，并在反动军阀密谋逮捕共产党人时，“李大钊和徐谦在鹿钟麟卫队的营房区躲避起来”。^③在冯玉祥访问苏联期间，李大钊同志又亲自致函冯玉祥，建议他回国参加北伐，“驰援陕西，东出潼关”^④。冯玉祥接受李大钊同志的建议回国时，我党还派优秀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同志随同抵达五原，帮助冯玉祥振兴国民军，并将我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国民军中普遍实行起来。所有这些，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⑤

冯玉祥赴苏联参观学习，会见了苏联党和政府的许多领导人，接触了“精明强干、富于朝气”的苏联党政机关人员，亲眼看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整齐活泼，井然有序”的社会风貌，通过这次活生生的考察，使冯玉祥“深深体会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⑥

总之，李大钊同志的亲自努力和我党在国民军中的政治工作，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当时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激发了冯玉祥将军爱国、救国的热忱。这是当时冯玉祥部队参加北伐，挥师东进的主要因素和历史背景。

（二）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决定了东进的大政方针：“固甘援陕，联晋图豫。”^⑦接着，国民军各部陆续开拔，

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解了“西安之围”，⑧刘镇华的镇嵩军⑨溃败退入豫西。国民军乘胜追击，中路刘汝明部越潼关，先头部队已进至河南阌乡。到十二月上旬，镇嵩军受冯部的穷追猛打，“一直退至豫境陕州，始稍停顿。”⑩这时，败退下来的镇嵩军，虽然还有六万余人，但军心涣散，前途渺茫，投冯或投奉，举棋不定。驻在潼关的国民军三路军总司令孙良诚，派其参谋张振江到陕县见刘镇华及其弟刘茂恩，就改编镇嵩军问题进行商谈。善于观察形势、看风使舵的刘镇华，对于国民军方面提出的和平改编，口称“愿意归顺”，实则表面应付。背后，“在陕县召集各部，重整旗鼓，饷饬仍由地方负担，民不聊生。”⑪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军刘郁芬部占灵宝，入陕州。吴佩孚电令柴云升坚守待援，不得再弃观音堂、浍池。”⑫。

一九二七年春，由武汉出师的北伐军和由潼关东进的西北军（即国民军），正向河南挺进。“河南党组织发动各地党员、群众，大力开展反抗军阀统治，迎接北伐进军的斗争。”⑬为贯彻党的这一指示，元月二十五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同中共党员张楠到达洛阳，二月下旬到达陕州，住在城南庙底沟地下党员任正光的家中，与冯玉祥派驻陕州做刘镇华工作的政治代表任佑民、凌勉之进行接触、谈判，欢迎国民军东进。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冯玉祥“与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商议进兵计划，以二万四千人直沿黄河向陕州东下，以一万人出洛河……”

⑭二月十六日派“李汉镇来往於潼关、陕州之间，探询消息。”⑮同时，为加强东进的政治宣传工作，让“刘伯坚制印豫西宣传品，并派

人前往张贴。”^⑥所有这些，都为国民军大举出关作了充分准备。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旬，国民军大举东进的日子临近，当时驻在陕州堵着出路的镇嵩军司令刘镇华，仍一脚踏着数只船。冯玉祥派人来时，他马上表示：“愿听指挥”。当冯玉祥的政治代表到了镇嵩军，刘镇华仍和奉军秘密联络，朝三暮四。於是，冯玉祥乃派孙良诚、方振武由潼关出陕州，将刘镇华击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国民军通电全国，誓师东征。电文发出后，陕西、河南人民热烈拥护，各地农民组织了欢送队，沿路供应茶水，河南许多地方的农协和农民自卫团开大会、发通电，请求国民军即日动师出关，并热情表示支援，“愿以农民自卫武装作为内应。”^⑦冯玉祥将军当时也非常重视农民运动，注意与农民武装联络。他在日记上写道：“河南红枪会势力极雄，关于农民运动，须设法联络之。”^⑧并召集所部各司、处长讲话，教他们支持河南红枪会，“设法接济其子弹。”四月中旬，“国民军政治部派到豫西一带去联络红枪会的同志陆续出关。”^⑨同时，还派了四十名铁道队员到前方去做秘密工作，这些铁道队员也都隐伏在陕州，时时探报敌情，准备在大军东征时，破坏敌人后方的交通。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冯玉祥在西安红城召开军民大会，宣誓就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改组第二集团军的编制，其军队编为六路，中路军由冯玉祥亲自指挥，沿陇海路东进。同时，致电共产国际，称赞“已经望见五一节的红光，从第三国际的中心地方映射到全世界、遍燃着革命之火……”，表示要“更坚决地拥护无产阶级的主张，希望革命的猛进。……”^⑩五月五日，冯玉祥

按照军事计划，发布命令，率师东征。“以国民军方振武等一、三路为先头部队，由潼关直趋灵宝等地，首先打击刘镇华、张治公等匪军”。^②方振武部与镇嵩军在函谷关一带接触，第二天（五月六日）就攻下函谷关，镇嵩军放弃灵宝县城，退守陕县大营。五月六日，冯玉祥赴潼关督师，这时，传来了李大钊等二十余人遇难的消息，冯玉祥即在潼关召开追悼大会，并电令各部队、各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全军官兵都臂带黑纱志哀。五月七日，国民军占领陕州，将刘镇华的旧部（指未经改编者）击溃，乘胜进攻。冯玉祥致电武汉政府，报告了进占陕州的消息。

当国民军攻占陕州时，国民军前敌政治部派往陕州的铁道队员，原打算在会兴镇弯道的斜坡上破坏铁路，截获镇嵩军的车辆。但是冯玉祥派往镇嵩军的政治代表任佑民得知此事后，极力阻止。於是破坏铁路的计划落空，攻克陕州之时，镇嵩军乘七列火车退去，没有受到阻击。

五月八日至十日，“国民军第一、三两路大军及骑兵部队，由陕州向洛阳方向追击。刘镇华溃败后，纷纷投降。”^②

在冯玉祥部队攻占陕州前，中共河南省委派往陕州的代表张景曾、张楠同冯玉祥的代表任佑民、凌勉之在陕州南街一个大杂货铺里开会交谈。省委方面对国民军东进表示欢迎，并请冯玉祥明察形势，支持武汉革命政府，反对蒋介石另立的南京政府。冯玉祥的代表对我党的意见表示赞同。接着，为欢迎国民军大举入豫，中共河南省委代表张楠、武汉政府的代表邓演达同到灵宝西关，与国民军副总司令于右任、三路军总司令孙良诚、政治部主任宣侠父、第

三师师长张兆丰和国民军的苏联顾问等一一见面，热烈欢迎他们东进。

在国民军进入豫西同镇嵩军和奉军作战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义勇军，在豫西军事委员会指挥下配合行动。“义勇军失败后，中共豫陕区委委员、洛阳特支书记王克新同志不畏艰险，在洛阳、陕州间坚持战斗，继续指挥工人和部分农民武装，破坏敌人的交通，袭击奉军和刘镇华的后方，使奉军感到后方的威胁而加速北退。”^②与此同时，豫西的红枪会也密切配合，“进攻洛阳，与镇嵩军激战四昼夜，红枪会退后，镇嵩军在洛阳、偃师、新安一带屠杀了五十四个村庄，人民被杀者两千余人。”^③其他各地民团、农民自卫团等，也协助国民军，一致讨奉，不断袭击敌人，打击军阀势力，对促进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总之，豫西人民付出很大代价，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军的东进。

(三)

国民军东进经陕州时，继先头部队方振武部之后，孙良诚、韩复榘、宋哲元、庞炳勋、吉鸿昌等部相继经陕州东下。当时，陇海铁路的火车只通到陕州，所以，这里就成为国民军出潼关后的一个基地和交通要道。孙良诚的前敌指挥部也移驻陕州，^④并委派其部要员凌勉之、徐惟烈先后担任陕县县长。他们接管陕县政务之后，革新政治，改革机构，将原县政府的六房改为科，城门上大书“建设新河南”匾额，宣布破除封建习俗，男人剪辫子，妇女放足，打神像，破迷信，雷厉风行，使陕州城气象一新。

国民军驻陕州期间，为落实其革命纲领，采取措施，迅速办了几件为群众所拥护的好事：

1、惩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县东的硖石乡，有一大土豪张瑞，家有土地数百顷，挂有“千顷牌”。在县内外有庄园多处，山寨一座，家丁百余人。他依仗权势，坑害群众，罪恶累累。冯玉祥部队驻陕县时，群众纷纷告状，冯部即包围张瑞山寨，俘其家丁，缴其枪械，将张瑞和其子捆绑受审，其子被枪决，张瑞被判处有期徒刑，倾家荡产，很快丧命。李村大土豪魏国藩，号称“县东一只虎”，作恶多端，也被国民军逮捕枪决，为县东人民除了一大害。在陕州城南关，又将两个贪官污吏一块处决，人心大快。

2、支持农工运动。冯玉祥部驻陕县时，大力支持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在国民军和冯玉祥委派县长的支持下，成立了“陕县农民协会”和“陕县妇女协会”，兴办了“农民补习学校”；农协会协助国民军惩办土豪劣绅，下乡到张茅、硖石一带斗争了土豪。妇女协会协助国民军和县政府着重抓了妇女放足工作，促进了广大妇女的解放。

3、训练“不扰民，真爱民”的军队。国民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上操时以“烟酒必戒，嫖赌必戒”代替“一、二、三、四”。开饭时要唱“吃饭歌”。平时不抢财物，夜间不入民宅。在当时，陕县人民先后经受了刘镇华的镇嵩军和岳维峻残军的抢劫掳掠，摧残蹂躏，相比之下，国民军就自然地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和拥护。

4、刻石立碑，广泛宣传其政治纲领。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

和苏联的帮助下，当时提的口号，制订的纲领和政策，都是进步的，倾向革命的。由于冯玉祥将军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革命时期的陕县城乡，颇有一番革命的气象。

陕州城南门是进城出城，通往车站的主要通道。在南城门外东侧立有一高大石碑，过往行人，一目了然。碑文为冯玉祥亲笔行书：

打倒贪官污吏劣绅土豪

在陕县观音堂七里村东洛潼公路旁边，亦立一六尺高的石碑，至今犹存。碑文为冯玉祥亲笔楷书：

- 一、我们是一定要**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
- 二、我们是要**建设极清廉的政府。**
- 三、我们是要**为人民除水害、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
- 四、我们是要**教育人民，使人人能读书、能写字。**
- 五、我们是要**训练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

国民军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为纪念在东进中牺牲的国民军将士，在陕州南关召开了“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场的十字街口，还用柏枝搭起了高大的祭门，两边写着一副对联：

誓师共北伐杀呀一声寒贼胆

凯歌吾南旋万岁三呼拓忠魂

在陕县南关，还修建了一座“国民军北伐阵亡将士公墓”，有一部分与军阀部队作战牺牲的官兵，就安葬在这里。

(四)

冯玉祥部队参加北伐东进时，经费困难，粮饷两缺。“所有官

兵在出潼关前，往往连小米杂粮都吃不饱。”^⑤为解决经济困难，他们只好用纸印制了“军用流通卷”，用它来兑换一些生活必需品。在陕州以西，由于国民军的威望，“军用流通卷”还勉强可用。但是，部队“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⑥

面对这样的经济困难，又要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迅速消灭军阀势力，会师中原，摆在国民军面前的任务确是非常艰巨的。但是，由于冯玉祥部队执行了我党的政治工作制度，官兵一致，士气高涨。人人都佩带着“我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誓死拼命”的胸章，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的雄壮歌声；无论在城镇或是农村，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借东西归还，损坏照价赔偿；宿营时不打扰群众，离开时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的军队人民拥护，群众欢迎，百姓支援；这样的军队才能克服困难，冲破阻力，无坚不摧。国民军某部夜间过菜元村时，为了不惊动群众，晚上在河滩搭起帐棚宿营，天不明即启程上路，第二天人们才知道是冯总司令的军队向东开了，都称赞这是一支好军队。部队过张茅、硖石一带，有的用了群众的麦秸喂了战马，有的吃了农民种的青菜，也都在麦秸垛根和菜地里放上银元或铜元，作为草费和菜费付给群众。当年目睹冯玉祥部队过陕东进的人们，现在回忆起来，仍连声称赞。

冯玉祥将军在总结北伐胜利的原因时，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广大农工阶级的扶助”列为根本两条，十分中肯的切中了要害。他在给所属各部的电令中曾特别强调：“军队中政治训练务需尽量灌输”，“对民众务须切实保护亲爱；对农工民众，尤宜推心置腹，

尽可能扶植其势力，拥护其利益，绝不可横暴野蛮，失掉民众同情。……”^②

冯玉祥当时的总结及下达的电令，正确地、客观地说明了国民军参加北伐，夺取胜利的原因。在我们纪念北伐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刻，重温大革命的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注释：

〔1〕见1982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2〕北京出版社出版《冯玉祥将军》第70页。

〔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177页。

〔4〕见1927年5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刘伯坚讲话。

〔5〕见198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李大钊烈士碑文。

〔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冯玉祥著《我的生活》（下）481页

〔7〕北京出版社出版高兴亚著《冯玉祥将军》100页。

〔8〕西安城自1926年4月18日被北洋军阀镇嵩军七万人包围，杨虎城、李虎臣部不足万人困守城内，至同年11月28日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解围，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围城斗争。

〔9〕刘镇华、字雪亚，直系军阀主要将领之一，任镇嵩军总司令。1927年春，率镇嵩军总部驻在陕州。1927年春北伐中，镇嵩军被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

〔10〕《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81页

〔11〕旧《陕县志》第一册

〔12〕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集207页

〔13〕河南《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六期20页

〔14〕1930年出版《冯玉祥日记》第二编12页

- [15] 《冯玉祥日记》第二编第18页
- [16] 《冯玉祥日记》第二编第21页
- [17]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46页
- [18] 《冯玉祥日记》第二编13页
- [19]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宣侠父著《西北远征记》161页
- [20] 见1927年5月23日《汉口民国日报》
- [21]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44页
- [22] 见1927年5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
- [23] 《红旗》1928年12月25日第六期，转引自《河南省地方志征文资料选辑》第三期
- [24] 三联书店出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八册138页
- [25]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宣侠父著《西北远征记》163页
- [26] 北京出版社出版高兴亚著《冯玉祥将军》94页
- [2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冯玉祥著《我的生活》（下）541页
- [28] 北京出版社出版高兴亚著《冯玉祥将军》98—99页

（刘全生执笔）

亲 切 的 勉 励

——记邓小平同志会见冯玉祥将军的亲属

冯洪达 余华心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早在两年前，分散在各地的原西北军和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随冯将军的老人们，即书信往还，酝酿纪念。去年年初，刘贯一、张克侠、苏进、赖亚力、尹心田等百余人，联名致书民革中央，要求纪念这个日子。民革中央据此上报中共中央，经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准，委托民革中央负责筹备。当我们得知这一消息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欢欣。

纪念会定于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接到通知后，我们和两个孩子分别于十三日赶到首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几十年未见的二哥洪志，他是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大会的，相见之下，二哥紧紧拥抱着我们，流下了热泪。居京的姐姐弗伐、理达、颖达和姐夫们，以及我们的第三代的十个孩子们，都快乐地相聚了。这是我们这一家空前未有、将来也难得的一次大团聚，父母亲如地下有知，该有多么高兴呵！

当天下午民革中央吴茂荪副主席告诉我们，小平同志第二天可能要接见我们。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半晌没说出话来，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小平同志这样忙，还能抽出时间来见我们，这

太叫人激动了！这一夜，我们兴奋得谁也没有睡安稳，担心小平同志临时有事，见不到他。

就象为了安定我们的情绪似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得到通知，下午六点钟在人民大会堂见小平同志。上午，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同志会见并宴请了我们。下午我们哪儿也没敢去，刚到五点，便动身去大会堂。

到大会堂后，我们被领进东大厅，只见刘澜涛、康克清、许德珩、杨静仁、平杰三、李定等同志以及民革中央几位副主席朱学范、屈武、吴茂荪、贾亦斌已经先到了。他们诸位与我们两家父母余心清、李德全都是老朋友，相见叙旧，分外亲切。九十三岁的许德珩伯伯，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七年在余华心家住过半年的事，他对我们说：“我刚刚离开你们家，你们的爸爸就被国民党逮捕了，那次危险得很。”

快六点时，听说小平同志就要来了，我们赶紧走近门旁，按年龄大小排好。接着就看见小平同志神清气爽地健步而入，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小平同志问道：

“弗能呢？”

“大姐弗能已经去世了。”二姐弗伐回答说。

“呵！”小平同志惋惜地轻轻叹了一声。

这时工作人员招呼大家说：“先照相吧！”我们按预先安排好的次序站好，镁光灯一闪，留下了永远对我们是最珍贵的合影。

大家入座后，小平同志语气十分庄重地说：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

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接着便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二姐弗伐首先代今晚没来的第三代向邓爷爷问好。小平同志笑着点点头说：弗能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弗伐说：“当时我也在苏联。”

小平同志回顾了一九二六年他开始与父亲交往的情景。他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来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姐的弟弟（弗伐插话：是李连成）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回到内蒙以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当时还检阅了部队，是马鸿逵的队伍。记得我们还和焕章先生在洪城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候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

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下又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都在杀共产党，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礼送出境。

小平同志说到这里笑了，他说，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因缘的。